



被发现的历史和风景

——读钱进的《发现扬州》

□ 周荣池

和钱进老师认识是我才进城工作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住处,也没有吃饭的地方,每天陪着我的就是一辆电动车。因为我做过教师,所以天然地就有一帮教师朋友,他们常带着我聚聚,虽然只是“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但给我留下许多温暖的记忆。认识钱进也是朋友介绍,吃饭的时候大家点头之交,因为我这个人向来聒噪,对于生性安静的人有时候自然地忽略了。也有一次偶然听到朋友介绍钱进老师生活的艰辛种种,不免也多了一份同病相怜的意思。但之后并没有太多的交往,以至于生活和工作的忙碌几乎不会主动再去联系了。

不过他虽然静默,但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沉寂,而是默默地在努力做一件事情。有一年夏天,也是在饭桌上听人说到一件和他有关的事情,这事算是壮举,让我很震惊和钦佩。他和同事乘单位的车去衡水学习,返程自己买了一辆二手车一路骑了回来。当然,他这一路是田野考察,走了很多自己心仪的人文景点。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一个业余的旅行家,而且写了很多地方地理、历史、文化考究的文章。于是我主动地去找他讨要这些书稿来看,特别是关于扬州部分的,因为其时我自己的工作也与地方历史文化有关系。

我真不知道一个工作繁忙的教师,一个静默无闻的人,能够从现实回到历史,从纸上发现过去,用笔头找回记忆。今天我们走在宽敞的马路上,坐在明净的屋子里,但是我们已经丢失了自己文明的密码。几千年前我们的脚下是绵延的海岸线,是草木茂密的平原,祖先们在茹毛饮血地创造着历史的开端和延续。这些我们已经不是忘记,而是根本无从得知,甚至历史有时候也就不

过几个字草草了事地说成“新石器时期”而已,具体什么样子没有人有能力去揭秘。但是我的这些担心原来也是杨绛先生所说“想得太多而书读得太少”,因为在我等杞人忧天地忧虑的时候,有一些人正在踏实地为我们的历史与记忆做一些积极的事情。钱进就是其中一位,并且做出了非常令人钦佩的成绩。

手上这本《发现扬州》我读过好几遍。我也算是这本书的出版策划人。这几年我帮助不少文友联系过出版的事情,这本书给我的印象是最深的。因为这本书来得艰辛,是用车轮走出来的,是用业余时间打磨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有着汗水。关于扬州的书很多,这一本算是系统、全面而又有个性特征的,它是一个人撰写的地方志。书中分述了扬州以及所属县市从远古地壳运动及至今日的地理、历史、人文以及经济情况,给扬州历史起了一个底。扬州钩沉、孟城春秋、宝地流韵、仪真山水等等,一个个段落篇章就像是一颗颗珍珠一样闪耀,而串起这些珍珠的是光阴、是历史,也是一个人孜孜以求的发现与创作。

这些年,我关于写作的思考很多,变化也非常大,以至于都不愿意写在纸上,因为写作是一件变数太大的事情,现在说死了以后就是笑柄。但尽管如此,写作又还是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大概就是现在流行语“初心”。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非常难。这一点钱进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那就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我们总是说自己繁忙,总是觉得自己已经成绩不凡,总是觉得自己还要问鼎高峰,可是除了夜郎自大的“穷狠”之外,我们究竟为了那句“不忘初心”的漂亮话做了点什么实在事呢?

钱进用《发现扬州》给扬州的历史一个答案,让我们看见了历史的模样;给自己的人生选择一个答案,那些被发现的生活和风景是历史给他的馈赠;也用业余写作者的身份给我们这些所谓的作家们一个严肃的答案,默默地坚持才是不忘初心的不二法门。

草堂公园现存古迹多是清代所建。

“草堂”两个大字,用碎青花瓷片粘于粉墙上,令人一新。清人能做出这样的设计,实在难得,很有现代主义的味道嘛(成都许多古建都有这样的装饰)。

“少陵草堂”碑当是整个公园的重心了,用玻璃罩着,立于草堂之下。四个大字是雍正的弟弟果亲王题的。果亲王必是康熙的儿子了,这对父子真是题字的能手,到处留痕(他俩是否知道这会让人审美疲劳的),真受不了他们了。我觉得,老杜家里的碑刻,还是诗人题撰比较好,苏东坡、陆游都可以啊。

至工部祠。当中供的自是老杜,他右手坐着陆放翁,左侧置着黄山谷。三位皆慈目细髯,如三尊菩萨,令人忍俊。文学史断言,在中国诗家,沾溉千秋,泽被万代,老杜为千古一人,从工部祠可以看出,这毫无疑问。他人祠堂,陪供的无非是袍泽、子孙,唯老杜家,两位陪供的俱是他“穿越”而来的学生,足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不过,我对某位陪供有看法。陆放翁志在恢复,生死以赴,其慷慨悲歌深得老杜精髓,对于他,我没什么说的。黄山谷呢?《峴嵬说诗》认为“山谷学之(杜诗),得其奥峭”。“奥峭”实在算不得杜诗的精髓。江西诗派自称学杜,字句典故确实翻奇出新,然虽瘦硬生新,但就学杜而言已失之偏颇狭小,远不及元遗山之“得其苍郁”。然而请下黄山谷,奉上元遗山,又着实难办(元遗山是金人)。呜呼。

了才能吃,不然拿什么来招待亲戚呢,总不能亲戚来了张手哦!这也是母亲的老生常谈。家人都知道这个理儿,但每每猪肉进门,母亲总要这样强

调。春节一过,从年初二开始,晚晌陆续来给父母亲及本家叔伯拜年来了。今天来了表姐,母亲割下一块肉,放饭锅里蒸蒸;明天堂姐夫堂姐来了,割下一块肉跟青菜烧烧。亲戚、家人一桌团,家人总算尝到肉味了。但待客得有待客之礼,就那么几块肉,家人怎敢动筷子?还不是见肉块子就让,见青菜就上? 撒上几筷子青菜跟饭拌拌,再倒点菜汤泡泡,一餐饭就过去了。

亲戚来了才吃肉,成了我们家那些年的“咏叹调”,好像只有亲戚来了,我们家才真正过年似的。正应了家乡的一句古语:“有钱时时节,无钱节节闲。”

中山路在三十年前还是高邮县城的中轴线,随着城市的东扩,如今被“移”到了城的西部边缘。从中山路与城河路相交

处开始,向南直到南门天桥,这段街道就是中山南路。中山南路长近千米,宽不足六米,两边店铺、民居多为民国遗留,建筑低矮,房屋老旧。这里没有官家府邸,没有名士故居,更没有私家园林,作为旅游景点可能还差那么一点意思。但对于岁数大一些的邗城居民来说,这里却是怀旧的好去处。黛青的小瓦,斑驳的砖墙,掉漆的铺面子门,还有各种老杂货铺,等等,每一个细节都会撩起他们怀旧的情绪,让他们在这里流连忘返。

我于1987至1990年在红旗中学(现第一中学)就读,红旗中学的大门就在中山南路上,所以对于中山南路多年前就熟悉,借用当年一同学语,“这条街我量了一遍又一遍,可是量来量去也没有变”。如今近三十年过去了,这条街上好多店面还保持着当年的风貌。各种面食店铺,包括饺面店、油条烧饼店、包子店、寿桃店等还是像当年那样热气腾腾,使得整条街上水汽氤氲、云遮雾绕。杂货铺依旧是过去那种货架和柜台,里面的商品多是一些其它地方难觅的家用物品:锅碗瓢盆,笤帚簸箕。小到针头线脑,大到瓦缸,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买不到。浴室、剃头店当年我都光顾过不少次,给我的感觉它们还是三十年前的模样。四德泉浴室至今还保留着那种二寸长、一指宽的竹篾子替代澡券,上面用漆写着“一室”“二室”,干脆让老浴客们怀旧怀个够。

中山南路附近渔民多,过去他们靠在高邮湖捕鱼为生,如今上了岸,年轻的大多数已经改行,但仍有不少岁数大的还在捕鱼。因此中山南路还有个特点是每天路边都有很多卖水产品的。活蹦乱跳的鱼虾、翻着白沫的湖蟹、盘子般大小的湖蚌,等等,这些湖鲜价廉物美,吸引了不少远近顾客来到这里。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每天上午中山南路都像赶集似的热闹。你要想了解高邮的市井文化,不妨就到中山南路走一遭,一定会有所收获。一座有品位的城市不应该只展现它

已年逾古稀的市作家协会原理事长肖维琪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把他从南京带回来的金实秋先生新出版题赠我的书交给我,我便骑电瓶车去取。

书厚厚的一本,封面淡雅,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的《补说汪曾祺》。这本书是金实秋先生所写的有关汪曾祺的文章合集,叶檀教授作序。收文共二十一篇,还附录了陆建华、肖维琪、陈其昌、金家渝等文章各一篇。书印得很精致,图文并茂,资料丰富,颇有珍藏价值。书中第178页《点击作家中的“汪迷”》一文,除写到了苏北、王干、费振钟、顾村言、古剑、鲍十、凸凹、杨栋、段春娟、施行、陈其昌、肖维琪、陆建华等十三人外,还有一小节专写了我。真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写我的一段不长,仅560字,抄录如下:

夏涛:汪老的老乡也。1992年,他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时,曾聆听过汪老的讲课,至今还保存着当时的听课笔记,珍藏着汪老签名本《汪曾祺自选集》《晚饭花集》这两本书。作为“汪迷”,夏涛继陈其昌之后,对汪曾祺关于家乡作品研究的开掘是别具一帜、颇有见地的。

2007年5月,扬州电视台《绿杨茶馆》节目组在高邮拍摄介绍汪曾祺的系列节目,他曾协助摄制组工作,随同摄制组到汪曾祺作品中出现的高邮那些地方进行拍摄和采访。此后,他又一次次地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细致的调查,一种近于追根寻源的多方打探和寻访,他先后与汪海珊(汪老的胞弟)、大英子长子张俊生、铁桥和尚的徒弟广如法师等多人短叙长谈,掌握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汪曾祺老家、汪曾祺与小英子往来的情况,发掘了一些有关《受戒》背景和人物原型的第一手资料,并发表了《关于汪曾祺经典小说〈受戒〉的访谈》,这对读者了解《受戒》中的人物、风俗、地理是十分有益的。夏涛还发表了一篇《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的文章,

中山南路

□ 吴忠

中山南路应该能代表我们邗城传统的、有地方特色的另一端吧。

说到中山南路,还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就是中山路208号。208号也就是当年我母校红旗中学的门牌号。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的红旗中学由于在生源质量较差的情况下,能做到高考质量与高邮中学有一比而名噪一时。这得归功于当时学校有一个优秀的教师群体和一个励精图治的领导班子。红旗中学在1988年,也就是我上高二的那年更名为高邮第一中学;十年后,即1998年迁址武安路至今。原第一中学校区全部划给一墙之隔的高邮师范。当年的高邮师范可谓大名鼎鼎,学校面对高、宝、兴等地区招收学习成绩顶尖的初中毕业生,培养小学和幼儿教师。学校的教师队伍中可谓人才荟萃,出过不少在文学、书画界在全省都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多少有志青年把高邮师范作为自己努力考取的目标,又有多少人因为没有能考上而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高邮师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校名就经过了数次更改。2002年,高邮师范与扬州教育学院合并,更名为“扬州教育学院高邮校区”;2007年,扬州教育学院与扬州职业大学合并,更名为“扬州市职业大学高邮学院”;2012年,扬州职业大学与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合并,学校又更名为“扬州市职业大学师范学院”。如今的学校已经搬迁至扬州文昌西路,只留下一座空空的校园。我前不久去校园看看,208号大门旁依然挂着“扬州市职业大学师范学院”的铜牌,还有“扬州科技学院(筹)”的竖牌。门卫室两个老者正在窃窃低语,对我的进入熟视无睹。校园内人去楼空,一片寂静。一座座整齐的教学楼和宿舍楼,绿草如茵的操场,红色塑胶跑道……仿佛都在无言诉说着这里曾有过的辉煌。此情此景,不禁让我唏嘘感叹:白云苍狗,世事多变,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汪曾祺的欣慰

□ 夏涛

文章详细地写到了汪曾祺故居的过去和现状,还介绍了寻访汪曾祺故居的一些作家之当时情景,其中有上海著名作家王安忆、顾村言、浙江

作协副主席刘文起、中国文学馆副馆长吴福辉、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评论家季红真、诗人冯光辉,还有美国学者戴伊、仲晋奎,香港大学文学院卢美茵教授等,文章在2009年第一期《翠苑》发表后,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我坦言,金先生高抬了我。我一个业余文学作者,写《漫谈汪曾祺和他的故居》一文,是出于一种偶然。陪《翠苑》常务副主编冯光辉先生拜访汪曾祺故居时,他听到有关介绍,深有感触,当场指定由我执笔来写这篇文章,并说无论写多长。致使我搜集资料、放开笔触,写了12000余字的长文,在《翠苑》上发表后,引起陆建华先生注意。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想写一本关于汪老笔下的高邮风土人情的书,专门联系汪老作品中的人物、风俗、地理等谈高邮。我认为此书虽不能成为畅销书,但绝对有价值。我自己想亲自动手,又囿于时间与精力。今天看了你的文章,忽然萌生一个想法,以你的踏实精神和对文学的执着,你就是个合适的人选。”时隔不久,陆先生为我列出了一个《受戒》访谈提纲,我根据提纲进行一次走访笔录。适逢《受戒》发表30年,访谈文章又在2010年《翠苑》第一期上刊载出来。仅此而已。我怎不愧对金实秋先生给我“汪迷”的封号,怎不愧对陆建华先生希望我这样一个汪曾祺家乡作者能为汪研工作多做点事的殷切希望呢?

今年元宵节,汪曾祺97周年生日的上午,在高邮皇华酒店召开的汪曾祺纪念馆设计方案商讨会暨汪曾祺追思会上,应邀赴会的金实秋先生传出消息,今年五月份适逢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祭日期间,全国约有20本有关汪曾祺的专著出版发行。此必将引发一波接一波的研读汪曾祺的热潮。这是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九泉之下也值得欣慰的事。

大集体时,我们生产队有个小型猪场,自繁自养几十头猪,猪粪肥田,肥猪卖钱算生产队收入。肥猪出栏前,队里有个打算,留两头猪年前宰杀,分给各户过年。

那些年,买不起鱼肉过年的“超支户”不在少数,就指望着生产队里杀年猪。我家就是这样的“超支户”。父母在生产队里一年苦到头,不但拿不到“余粮钱”,还亏空生产队里的钱,哪里有钱为我们添新衣、买年货,过时节还不是跟平时一样。

待到腊月二十左右,生产队里的猪终于脱白躺在案板上。按人头分猪肉,我家分到二斤半左右的肉。母亲把碎碎叨叨的几块肉(有槽头、屁股、肋条,是搭下来分派的)全都腌制起来,并反复嘱咐家人,过年都不能动它,亲戚来

亲戚来了才吃肉

□ 秦一义

春节一过,从年初二开始,晚晌陆续来给父母亲及本家叔伯拜年来了。今天来了表姐,母亲割下一块肉,放饭锅里蒸蒸;明天堂姐夫堂姐来了,割下一块肉跟青菜烧烧。亲戚、家人一桌团,家人总算尝到肉味了。但待客得有待客之礼,就那么几块肉,家人怎敢动筷子?还不是见肉块子就让,见青菜就上? 撒上几筷子青菜跟饭拌拌,再倒点菜汤泡泡,一餐饭就过去了。

亲戚来了才吃肉,成了我们家那些年的“咏叹调”,好像只有亲戚来了,我们家才真正过年似的。正应了家乡的一句古语:“有钱时时节,无钱节节闲。”